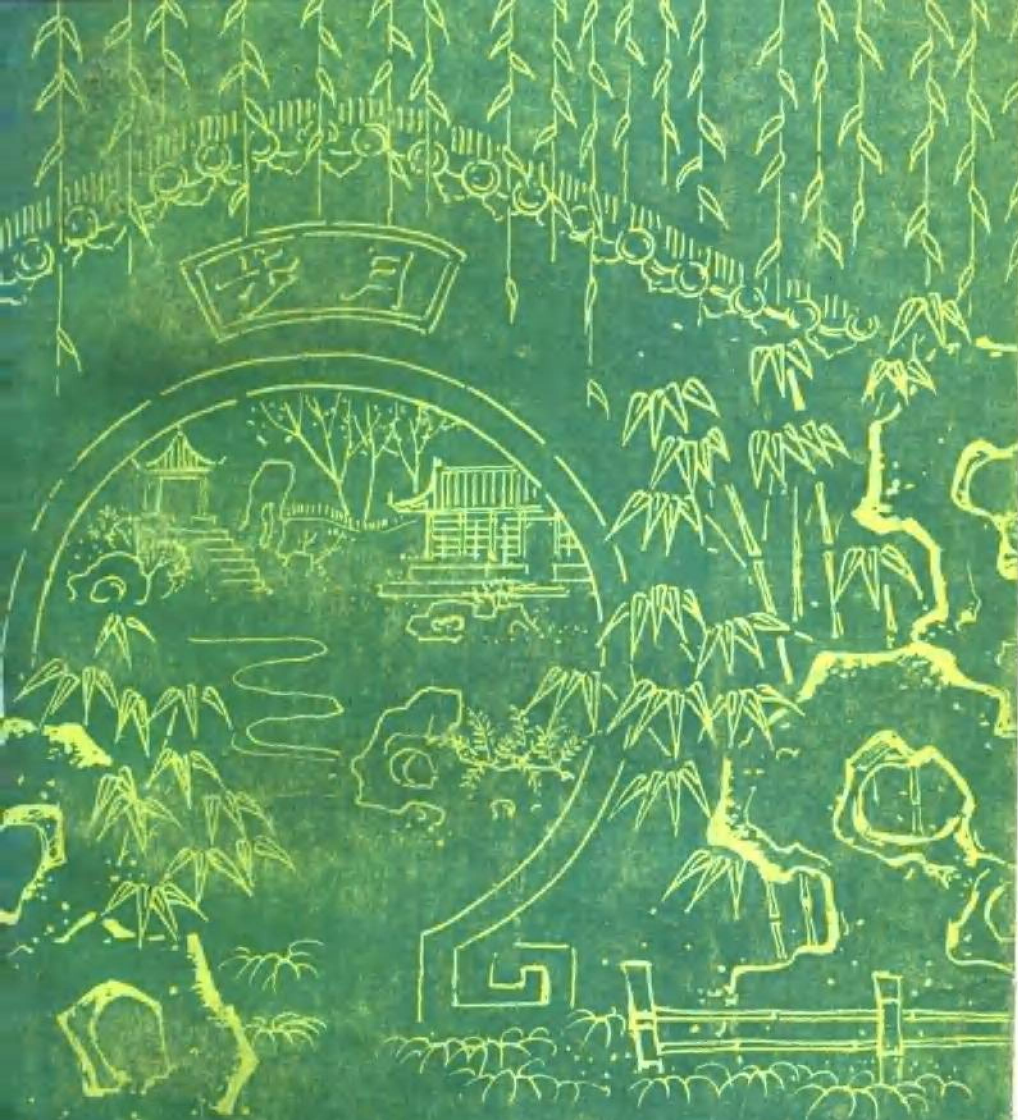




廣陵潮

李涵秋 著

裴效維 校點



广 陵 潮

(上、下册)

李涵秋 著

裴效维 校点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3.375 字数: 1007 千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48,000 册

*

书号: 10397-50 (全两册) 定价: 8.3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以中法战争之后到“五四”运动前夕的历史为背景，以江南小镇扬州城作舞台，以秀才云麟与表妹淑仪、妻子柳氏、情人红珠的爱情婚姻纠葛为线索，展开了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悲喜剧，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真实地再现了清末民初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面貌。

李涵秋及其《广陵潮》(代序)

一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由于社会变革的需要、外来小说的影响以及印刷技术的进步等多种原因，我国的小说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其主要标志是流派迭兴、作家辈出、作品繁多。其中有一种流派，被当时人称作“社会小说”。这种小说，远承《儒林外史》的传统，近接“谴责小说”的余波，因而也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是当时社会意义较强、社会影响较大的一个小说流派。李涵秋就是这一流派的一个代表作家。

李涵秋（1874年—1923年），本名应漳，别署沁香阁主、韵花馆主，涵秋乃其表字。祖籍安徽庐州（今合肥市），在太平天国时代迁居江苏扬州（今扬州市）。其祖父和父亲均以经营烟草为业，家道尚称小康。不料李涵秋年仅七岁，其父一病不起，烟店又被他人侵吞，一家孤儿寡母四口（李涵秋尚有一弟一妹），幸赖其叔父周济，才得以勉强维持生计。李涵秋年十七，即设帐授徒，以养家活口。年二十，中秀才。次年，又成廪贡生。年三十一，受聘前往湖北武昌，依然坐馆教读。当时武汉有文学社团“汉上消闲社”，社员达数百人。李涵秋也是社中一员。由于他对同人中以“持文谒大府，一诗博升斗，一赋易簪纓：上陈孺慕

私，中叙吮舐苦，末言涕泪零，隆恩犬马补”的下贱行为深恶痛绝，因而在诗中多有讥嘲，如有“门外野狐多凭陵”等句。被骂者恼羞成怒，群起而攻之，以致笔战达一年之久。李涵秋从容应战，理直气壮，笔锋犀利，使对手狼狈不堪。于是又以革命党诬陷李涵秋，几成冤狱。李涵秋在武昌坐馆六年，不仅领教了无耻文人的阴险狡诈，而且认识了政界的黑暗肮脏：“一入政界，有如素质之衣，便染成皂色，虽再掬水洗濯，恐不能还我本来面目矣。”遂于三十七岁那年的年末，怅然回乡。从次年起，先后执教于两淮高等小学和两淮师范，一直到他临终的前三年，才辞去教职。他一生从教整整三十年，高徒遍江淮，桃李满天下。如张碧梧、陈汝衡、石楚卿等，就都是他的学生。

李涵秋不仅是一个诲人不倦的好教师，而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学家，诗、文、字、画，无不精通。不过他的闻名于世，却在于他的小说。他从三十二岁才开始小说创作，在以后的十八年中，仅长篇小说即写了三十几部。合计不下一千万言，平均每年两部以上，数十万言。这对于一个身兼两校教职的作家来说，实在不能不令人惊叹。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就在他临终前的两年之内，他一方面身兼上海《时报》、《小时报》和《快活》旬刊的主编，一方面又同时为五家报刊撰写五部长篇小说，逐日连载，从不间断。这种敏捷的才思和勤奋的精神，只有稍后于他的张恨水可以与之颉颃。李涵秋之所以如此勤奋地写作，固然与他以卖文养家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在于他对小说的社会作用有一定的认识。他曾说过：“我辈手无斧柯，虽不能澄清国政，然有一支笔在，亦可以改良社会，唤醒人民。”因此他的作品无不取材于当时的现实，写作态度也相当严肃。正因为长期呕心沥血地勤奋写作，所以年仅五十，便突发脑溢血而卒。

二

《广陵潮》既是李涵秋的代表作，也是当时社会小说中的佼佼者。作者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始写作，直至民国八年（1919年）才全部完成，历时达十二年，相当于作者一生从事写作生涯的三分之二。可见《广陵潮》几乎是作者毕生精力的结晶。无怪乎此书问世之后，读者争相传诵，再版达十几次，李涵秋也因此而被誉为“第一小说名家”。

从表面上看，《广陵潮》的中心内容，似乎不过是一个多角的爱情婚姻故事，与当时流行的言情小说也没有多大差别。有人把它归入鸳鸯蝴蝶派小说，大概就出于这种看法。其实，这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见。实际上，《广陵潮》与《红楼梦》一样，它是以爱情婚姻为中心线索，熔铸了从中法战争之后到“五四”运动前夕这三十年的历史。这三十年，是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其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以戊戌变法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期；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为标志的复辟倒退时期。这三个时期的社会状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各种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态度等等，在《广陵潮》里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作者起初把它命名为《过渡镜》，又在书中强调它的“镜子”作用，是不无道理的，在一定程度上说，它确实是反映清末民初社会的一面镜子。茅盾先生说过，要了解晚清社会，不能不看《广陵潮》，确是一语破的之论。

三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曾经指出，清王朝自嘉庆（1796—1820）以后，一方面实行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在对外战争中屡次遭到可耻的失败，从而证明了这个腐朽的王朝只有镇压人民的本领，而没有保卫祖国的能力。于是，有识之士“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这是鲁迅先生对晚清“谴责小说”的产生和内容所作的概括。这个概括，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广陵潮》，因为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同“谴责小说”一样，也是暴露封建专制制度末期——清朝末年的政治和社会黑暗的。作品所写的辛亥革命之前的扬州城，实际上就是整个晚清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形形色色的官僚、土豪、流氓等败类，构成了一股巨大的邪恶势力，一方面互相吞吃，一方面共同压榨人民。

在这一股社会恶势力当中，贪官污吏是人民最大的敌人，因为他们掌握着地方政权，对人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因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广陵潮》皆有所揭露，如江都先后任知县、昏官全福和毕升，都是贪赃枉法的家伙。这伙贪官还依靠和勾结土豪劣绅，形成一股欺压百姓的势力，简直无恶不作。如劣绅石茂椿，依仗自己曾经做过道台，又有藩台做靠山，便连知县毕升也不放在眼里，不仅可以决定毕升的“考成”，而且可以左右毕升的前程，只要一个电报给藩台，便可“立刻撤了

他的任”。因此，毕升对他百依百顺，唯命是从；同时，又狼狈为奸，互相利用，合伙鱼肉人民。单是一项“修理街道捐”，他们两人便可“每人三千串文稳稳到手”。这种官绅勾结，共同把持地方政权的恶政，不独晚清如此，整个封建社会无不如此，只是晚清更为严重罢了。因此，这种暴露具有很大的典型性。

贪官污吏在人民面前虽然如狼似虎，但在洋教士面前却象乌龟兔子。如市井无赖顾阿三原本一贫如洗，可一旦入了天主教，便身价百倍，甚至用卑劣的手段占人新妇，仗着洋人撑腰，县官也不敢过问。这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晚清社会的真实写照，既揭露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横行霸道，也谴责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

清朝末年，除了盘踞在上层对人民进行残酷压榨的统治者之外，在社会的下层还活动着一大批流氓、地痞、无赖、骗子以及儒林败类，这是封建道德已经崩溃、满清王朝即将灭亡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广陵潮》中，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卑鄙无耻，拼命追求金钱。为了钱，可以霸占孤儿寡妇的财产（如田焕夫妇），可以陷救命恩人于死地（如林雨生），可以做六旬老太婆的小丈夫（如杨靖），可以当死人的干孝子（如田福恩），可以出租自己的妻子（如饶三），可以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做暗娼（如刘祖翼），甚至居然想毒死自己的生身父母（如田福恩）。就是腐儒何其甫，也竟然撕掉假道学的面具，去讨一碗茶钱的便宜。这充分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逐步深入的情况下，封建统治阶级及其附庸对金钱的强烈欲望。

除此之外，《广陵潮》把当时社会的其他“怪现状”，一一加以披露。如算命算卦、烟馆、妓院，权贵们吃喝玩乐，尽情享受。

“酣歌醉舞，沉溺其中。白日里丝管嗷嘈，黑夜里牛衣对泣。……正如燕巢危幕，幸其火未及身，快活一刻是一刻”。这里真

实地写出了清朝覆灭前夕，统治阶级及其爪牙们预感到即将灭亡，因而精神空虚，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心理。

上面的简单分析表明，《广陵潮》对晚清社会的暴露，毫不逊色于当时最好的“谴责小说”。在今天来说，无疑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四

然而，《广陵潮》毕竟不是“谴责小说”，它与“谴责小说”有着本质的不同。“谴责小说”作家大多是改良主义者，他们暴露封建专制制度，并不是为了推翻这个制度，而是为了挽救这个制度。因此，他们对资产阶级革命采取了完全敌视的态度。李涵秋却不是这样，他对清王朝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他的理想是“大家齐心竭力，另造成一个簇新世界”。在李涵秋看来，辛亥革命虽然不能尽如人意，却也是资产阶级力图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而“另造”一个新世界的尝试。因此，李涵秋对辛亥革命采取了基本肯定的态度。

首先，李涵秋在《广陵潮》里塑造了一个几乎是十全十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正面形象，这就是富玉鸾。这个富玉鸾，本来是个富贵公子。但是，清王朝的腐败不堪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使他痛心疾首。卢梭的《民约论》等书籍，又使他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以为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一着，便是出洋留学”。于是毅然将家财分散给乞丐和穷人，奔赴日本。辛亥革命前夕，他回到祖国。本来计划帮助武昌起义，由于清政府搜捕，只得回到扬州，与当地会党联络，准备在扬州发动起义。不幸被他曾经救济过的林雨生告密，以至被

捕，押送南京。他在反动派面前表现得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制台暴跳如雷，他却“不慌不忙，向地下盘膝而坐”。制台问他同党有多少人，他厉声答道：“咱的同党，除是你们一班满奴，醉生梦死，不识高低，其余大约都是咱的同党！”制台喝令“将富玉鸾上身衣服剥得干净，绑上天平架子，倒山也似的藤条子飞舞”，以至“血花飞溅，顿时成了一个血人”；而他却“置生死于度外，咬牙忍受，不则一声”，终于壮烈牺牲，死时年仅二十来岁。富玉鸾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使惯于冷嘲热讽的李涵秋，也不得不发出“千秋不朽”的赞叹。

富玉鸾不但立场坚定，视死如归，而且思想超群，颇有高见卓识。他没有被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具有坚定的民族自信心，认为“我们中国同胞的聪明，也断不让于外人”。他也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不赞成盲目“排满”，指出所以要推翻清政府，只因它“将好好河山转送给别人手里”，这个“别人”也就是帝国主义。因此，他提出革命的“宗旨不过是拯救同胞”的主张，反对滥杀满人和为清政府服务的官吏和士兵。他对革命和建设的关系也有正确的认识，以为没有破坏，“也断没有建设的日子”。富玉鸾的品质也很高尚。为了成全云麟和淑仪的婚姻，他宁可牺牲自己的幸福，甚至为此而出家当过和尚。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却对被牵连的云麟的命运异常关切，当他听到云麟出狱的消息后，“心中这一欢喜，比他自己遇了赦还胜十分”。

富玉鸾这个形象，确有作者理想的成分，不过基本上是对现实生活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艺术概括，只要翻开辛亥革命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少象富玉鸾这样的人物。因此，富玉鸾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作者赞赏革命党人和辛亥革命的一种

表现。而且，在同时代的作品中，象富玉鸾这样的形象是并不多见的，因而更显得难能可贵。

其次，从《广陵潮》对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不同描写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对辛亥革命的肯定态度。譬如，武昌起义后，扬州的百姓们虽然有点害怕，但毕竟表示了欢迎的态度：“分闾城地方为二十五区，每区若干家，每家若干人。是凡有男子的，日里照常营业，夜间不许睡觉，手里各执一个红灯笼，大街小巷，排列得如同白昼”，“恭候革命党大驾降临”。可是当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拥护袁世凯当皇帝的，只有一心想做大官的“通儒”和一心要找个“升官发财捷径”的无赖廩生刘祖翼之流；而赞成张勋复辟的，更只有旗人“宗社党”、腐儒何其甫和旧官吏程宗敬等清朝余孽。凡是正直之士和广大人民，对袁世凯和张勋的倒行逆施则或者表示反对，或者冷眼相观。所以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张勋复辟更只有十二天。当扬州人民听到张勋失败的消息后，“莫不欣喜非常，大呼民国万岁”。这种描写是否真实，这里可以不论，重要的在于，它反映了作者赞成辛亥革命，反对复辟倒退，赞成共和制度，反对专制制度。

但是，辛亥革命尤其是民国的黑暗政治，显然不完全符合李涵秋那个“大家齐心竭力，另造成一个簇新世界”的理想，因此他又对辛亥革命和民国政治的黑暗作了尖锐的暴露。这种暴露所具有的意义，作者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甚至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但由于作者基本上忠实于现实，所以在客观上等于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

首先，我们从《广陵潮》里可以看到，辛亥革命确实不是一场全国人民“齐心竭力”从事的革命运动，而只是少数人在冒

险。革命不了解人民，人民也不了解革命；革命没有发动人民，人民也不关心革命。所以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扬州人民虽然对知县毕升的残酷压榨无比痛恨，却并不寄希望于革命，反而“焚香祝天，保佑这毕大老爷早早高升，别调优缺”。甚至在辛亥革命进行当中，还发生了武昌市民因害怕而争相逃难，以致造成践踏而死的惨剧，以及“黄天霸只手陷扬州”的喜剧。这一切都说明，辛亥革命与人民之间的隔膜是多么严重。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所谓“辫子”问题。辛亥革命之后，对于不少人来说，剪不剪辫子成了一个需要“万种踌躇，百端斟酌”的大难题：不剪则民国政府要“干涉”，甚至要“办罪”；剪掉则一旦清朝复辟，便有不忠“故君”之罪。于是只好采取折衷的办法：“剪去一半，留着一半。留的那一半，挽成一个小髻儿，藏在帽子里，走出去，外人看着好象是剪了辫子似的。只等大清国一朝重复过来，他们老实仍然将那一半辫子垂出来。”这半条辫子，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的人心不定。这类人物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也还分两种情况：极少数封建余孽是盼望辛亥革命失败，清王朝复辟；而绝大多数的百姓则是担心辛亥革命失败，清王朝复辟。但无论是盼望还是担心，却都不是没有道理的。清朝余孽张勋和他的军队就一直留着辫子；并在辛亥革命六年之后，这些“辫子兵”不但开进了北京城拥清废帝溥仪复辟登基，而且“对于没有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鲁迅语）。可见李涵秋描写辫子问题，并非小题大作，而恰恰是抓住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一条大“辫子”——由于脱离人民而使自己软弱无力，因而导致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也就给反动派创造了复辟的条件。

其次，我们从《广陵潮》里还可以总结出辛亥革命的另一条

教训，即由于革命队伍的极端不纯，造成了革命的最后失败。资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在一开始就是很复杂的，其中既有富玉鸾那样的真正革命党人，又混进了不少强盗、骗子、地痞、无赖、假革命党人等，宋兴、饶二、饶三、柳春、明似珠就是他们的代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党人蜕化变质、腐化堕落的情况也相当严重。有的树党争权，有的拚命捞钱，有的大娶小老婆。上海都督真济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最为严重的是，辛亥革命没有对反动势力进行必要的打击，反而敞开大门，让他们钻进了革命队伍，甚至掌握了各级政权。如无赖田福恩，居然当上了初选议员；劣绅石茂椿，更做了扬州民政署长；土豪钱万能，也做了个“清乡委员”。更有甚者，大小前清官吏，摇身一变，也都变成了民国的大员。如原江都知县毕升，“依旧做了民国的官员”；“清朝那些红顶子、蓝顶子的大老官儿，丢掉了清朝，他们一般的仍有本事在这民国里骑马的骑马，坐轿的坐轿，依然轰轰烈烈”。最典型的例子是扬州。在清朝官吏刚刚逃走，民军尚未到来之际，一伙社会恶棍便乘机麇集在一起，“不到半个时辰，一个不曾成立的民政署”，从民政署长到大厨师头儿的大小职位，已被他们瓜分得一千二净。这些人投机革命当然毫不奇怪，问题在于，革命党人不但不予以打击，反而加以默认。如民军头领孟海华进驻扬州后，就马上承认了石茂椿们的民政署，让它与自己的军政分府“遥遥相对”，分庭抗礼。李涵秋的这种描写，实在不是虚构，而是当时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

革命党人一方面脱离人民群众，一方面又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其结果当然只能是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因此，选议员而贿赂公行，借“清乡”以陷害良善，发奖券则坐地分赃，以至“民穷财匮”，“十室九空”等等，也就成为“中华民国”典型的

“德政”了。李涵秋用“藩镇纵横，内阁更代，什么国利民福，简直拿它做着招牌，各营私利”来概括民国的黑暗政治，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之论。

五

李涵秋是生活在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作家，他所处的这个时代，他所出身的那个封建阶级，他所受的封建教育，以及当时文学领域的复杂情况，都对他有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从而造成了《广陵潮》在思想方面的严重缺陷。

《广陵潮》虽然表现了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可是对人民也有严重的歪曲。一方面，作品过分夸大了人民的落后性，把他们描写成一群毫无反抗精神、任人宰割的愚民；另一方面则说“穷光蛋昧了良心，无恶不作”，把不少穷人写成了坏蛋。在这种错误观点的指导下，使作者歪曲了那些参加辛亥革命的会党分子的形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歪曲了辛亥革命。

《广陵潮》的作者对封建专制制度、封建统治阶级、封建迷信思想等都有不少糊涂观念。譬如，作者不知道中国贫弱的真正原因，而以为是“被那咬文嚼字的腐儒弄坏了”。作者一方面批判封建迷信思想，一方面又宣扬封建迷信思想，如秦氏和黄氏求子得子，杨古愚、杨靖、田焕见神见鬼等，荒诞不经，一派鬼话。作者虽然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倒行逆施，但认识不到袁世凯作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反动本质，因而错误地认为袁世凯恢复帝制是几个“通儒”“劝进”的结果。

《广陵潮》的个别篇章、个别词语，格调不高。对于这一点，甚至连与作者同时代的人也表示不满。如曾经为李涵秋

《新广陵潮》作过续写工作的程瞻庐，就曾说《广陵潮》“描绘风情，太露色相”。虽然我们在校点中作了必要的删节，但仍难免留有痕迹，我们今天的读者，应该坚持批判的态度。

李涵秋虽然有“另造成一个簇新世界”的愿望，但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个“簇新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当然更提不出到达这个新世界的正确途径，他所提出的所谓“救国救民”的办法，无非是当时流行的“振兴实业”、“大办学校”等老生常谈的论调。而且就连这些老生常谈，他也并不完全相信，所以最后又陷入“因果报应”的泥潭，只好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循环，理无不爽”的“劝善”经文，来消自己的“块垒”罢了。

六

在同时代的小说作品中，《广陵潮》的艺术成就是比较突出的，这也是它曾经蜚声文坛的原因之一。

《广陵潮》摆脱了《官场现形记》那种把许多小故事连缀起来的结构方式，而取法于《红楼梦》。具体来说，就是以扬州为背景，以云、伍两家为中心，以云麟、淑仪、红珠的爱情婚姻为线索，把众多的人物和事件贯穿了起来。贯穿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有的靠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有的靠事件之间的自然联系，有的用虚写，有的用倒叙，有的更用搬迁人物的地点来实现。比如，为了写富玉鸾，就让富家由北京搬回了扬州；为了写武昌起义，就让伍晋芳到武昌去做官；为了写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又让伍晋芳一家到上海去逃难；等等。因此，全书虽然人物众多，头绪纷繁，内容复杂，却井然有序，浑为一体，象现实生活本身那样自然。

《广陵潮》也摆脱了“谴责小说”那种一般以罗列“怪现状”来表现作者思想的写法，而着重塑造人物形象，寓作者思想于形象之中。比如，作者拥护辛亥革命的思想，就主要是靠塑造富玉鸾这个形象来表现的。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也不在少数。这是《广陵潮》文学价值较高的主要标志。

《广陵潮》的作者对群众语言比较熟悉，而且受到《红楼梦》语言的影响，所以《广陵潮》的语言相当成功。最精采的是人物语言，一般都做到了个性化。不但因年龄、性别、出身、教养等不同而语言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也因性格不同而语言各异。例如，“女秀才”朱二小姐和泼妇周氏的语言，固然有天渊之别；即如同样都是“女秀才”的朱二小姐和柳氏，也因一个尖刻，一个贤惠，所以她们的语言也各有特色。此外，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很有幽默感，善于冷嘲热讽和嬉笑怒骂。

《广陵潮》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也就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所概括的“谴责小说”的毛病，即：“词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不过这种缺点只存在于《广陵潮》的个别章节之中，从整个作品来看，仍不失为清末民初社会的真实写照。

七

我们可以肯定，《广陵潮》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有阅读价值。然而在解放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广陵潮》被视为历史的垃圾而加以摈弃；再经过那个“史无前例”的“横扫一切”的运动，《广陵潮》更濒于失传的危险。因此将它重新出版，不

仅是为读者提供文学读物，而且具有抢救文学遗产的意义。

《广陵潮》的版本很多，仅将笔者所知略述于下。

《广陵潮》原名《过渡镜》，从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在汉口《公论新报》上连载。至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该报因武昌起义而停刊，此书也就中辍，仅登前五十二回。民国元年（1912年），《震旦民报》请李涵秋续《过渡镜》，因在稿费问题上发生争执，只登第五十三回。民国三年（1914年），《过渡镜》易名为《广陵潮》，又在上海《大共和日报》从头登起。次年夏，该报停办，此书也再次中辍。越二年，此书又移栽上海《神州日报》。至民国八年（1919年），登到八十回，又一次中辍。故八十一回至一百回只见于单行本。

《广陵潮》的单行本至少有三种：民国四年（1915年），上海国学书室刊行初集、二集、三集，每集十回。旋将版权卖给了上海震亚图书局，该局即陆续分十集出版了百回足本，以后又再版了十几次。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上海百新书局重印为四册本，每册二十五回，以后至少再版过一次。

《广陵潮》的报纸连载本，如今已经残缺不全。就连单行本也极其罕见。笔者此次校勘，即以震亚图书局的再版本和九版本为底本，参以百新书局的二版本。校勘原则，是既要尽量保持作品的本来面貌，又要使它通达可读。因此只限于文字上的订谬正误，在内容方面原则上不作更动。同时加上新式标点，并按内容划分大段，且改繁体字为简化字，以便读者阅读。这里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特别说明：

一、原书产生于清末民初，当时的语言习惯与现在不尽相同。如代词“他”，兼含“她”和“它”二词。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这三个代词才逐步区分开来。因此一仍其旧。其他类